

论“义肢”的概念

——保罗·维利里奥技术思想中的一个维度

郑兴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导论

维利里奥的文本中，技术问题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不过，他对技术问题的探讨，主要经由两个路径，也即围绕着两个关键词展开论述，一方面，是通过对种种“意外”的思考，来的技术的负面维度，另一方面，主要是考察和人类生活发生紧密联系的种种现代“技术物” (technological objects)。这些“技术物”被维利里奥统称为“义肢” (prosthesis)。本文要探讨的是，“义肢”在维利里奥的笔下，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它对我们的人类自身产生了那些影响？本文试图通过维利里奥的相关文本梳理这一关键词，并通过与当代法国技术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的相关论述的比较，以此形成对于维利里奥“义肢”一词更为全面的理解。

一、义肢与身体

“义肢”本指协助残疾人行动的医学假肢，但在维利里奥的文本中，已经指代一切延展人类自身的感官能力和肢体能力的工具，当然，最主要指的是种种现代的技术物。比如，汽车做为一种载具，也是带来了快速移动能力的义肢，手机作为一种义肢则带来了远距离通讯能力。但与此同时，这种能力的“增强”并不是直接使得人类身体自身能力的增强，这种附加的能力是“寄生”在“义肢”之上的，必须经由“义肢”作用于身体，“能力”才能出现。因为“义肢”的使用，维利里奥将人类对自身所处世界的体验划分为两类。一种最初始的、最直接的是经由自身身体而对这个世界的直接 (immediate) 体验：以肉眼直接视看这个世界；用肢体触摸物体，和他人发生身体接触；用肉身经受地球重力的吸附，或静止于地面，或通过双脚移动。人类的最初的对于整个世界的体察，即他对这个世界的面貌的认知、他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和在这个世界中和其它存在物间的关系的体认等等，都是以这些以自身身体为中心的直接体验为基础的。但在“直接体验”之外，人类还有间接 (mediated) 体验。但是维利里奥这里所说的“间接”不是指语言文字带

来的符号层面的认知的媒介化，也不是指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借以把握这个世界的“先验”（a priori）能力，而是指人类经由“义肢”（Prosthesis）的中介之中而“体验”他所处的世界。对维利里奥来说，种种的“义肢”的“中介”，当然给人类提供了无限的便利，但是，也同样带来了种种隐忧。

首先，当身体与外来的义肢相结合，它开始依附于义肢。这种依附不单单是指今天所谓的电子设备所带来的“成瘾”，而是就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而言，实际上所有作用于身体、延展了身体能力的工具，都可以带来一种依附和迷恋。最直观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义肢”提供了舒适和便利。“义肢”所能提供的“额外”能力往往超过人类自身身体的能力，并且可以使得人自己不需要再动用自己的身体，那么，带来的后果是，一旦人类开始能够使用义肢，他们就再也不愿离开义肢。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使自身处于“舒适”的境地，那么，他们自然要以最少程度的对自身躯体和感官的主动运用，达成自己的目标。如果有“义肢”能够让自己免于主动驱使、运用身体（因为一旦使用就意味着需要耗费能量，意味着疲劳），他们自然倾向于更加省力的方式。这是人的本能。这也就是维利里奥所说的“最少行动法则”（Law of least action）。就像在电梯诞生之后，依然使用楼梯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很少有人能够主动拒绝新生的“义肢”所带来的便利。而之所以人类不断发展技术，其实也是因为受到这个本能的驱使。“最少行动法则”是人类发展自身技术的一个重要动机。

但维利里奥还认为，此种“迷恋”，还因为，“义肢”与身体的结合之中，隐藏了一种“色情”。“义肢”除了提供的舒适和便利之外，它们作为外来物，在直接作用于身体的同时，身体和外来物发生了融合，二者的相互连接造就了一种快感，它来自于身体的原始本能。这种色情意味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开始使用马匹，而马匹可以视为是种种现代的汽车、火车等载具类“义肢”的雏形。维利里奥追问：我们是如何想到把自己的身体和马匹的身体联结在一起的？最早期的“骑乘”行为是出于什么动机而发生？当人类为运动的动物内部的“载具特性”所着迷，为动物肢体中的“马达”所诱惑，产生了与“坐骑”结合的欲望，其实就是产生了一种与“外来身体”、即与某种不同于自身身体的躯体相结合的渴望。骑乘所带来“无移动的舒适”是一种与异己身体的“融合”。人类对于异己身体的原始渴望在马背上得到满足，对马背的征服，其实是男性对于异性身体的征服的一种延伸（*Negative Horizon*）。就像原始社会的女性身体既是男性身体的欲望对象，也同时曾作为一种“载具”承担族群中的后勤任务，马匹同样具有“欲望对象”和“载具”的双重维度。载具，不单是提供“速度”的工具，它还与人类身体的“快感”联系起来。维利里奥从中窥见了一种“色情”：人类社会早就存在性倒错（sexual perversion）行为，在古希腊

和古罗马时代都有关于“恋兽癖”（zoophylie）的记载，有此癖好之人只能通过与动物发生性行为才能获得性满足。而人类通过将自身身体与马匹的身体融合，当两个迥异于对方的身体神秘联结，其实可以被视为是“恋兽癖”的变相满足。

这种“恋兽癖”更在今天更产生了它的现代变种，成为一种“性偏移”（sexual diversion）（“倒错”说到底还是局限在动物性的范畴之内，“偏移”则已经转移到另一类对象之上了），即人类身体与汽车载具、乃至与各种其它的现代“义肢”的融合（*Negative Horizon* 45）。今天的汽车作为一种载具，当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义肢”，同样也延续这种“色情”意味，人类的身体在与它们的结合的过程中，一样获得了一种与“异己”身体结合的快感。现代男性对于汽车的迷恋，不单单是对速度的迷恋，更加是出于与异己“身体”结合的一种色情心理，机械躯体不过是动物身体的一个现代变种。这也就解释了，在汽车宣传的展台上，一台新的样车旁边往往配上一个美女车模，因为这其中的色情意味是相通的。维利里奥认为，这种“色情”推广到今天所有的现代技术物之上也同样适用。维利里奥挪用了“恋兽癖”的词根，生造了一个新词，此即“technophylie”，由“teche”（技术、工艺）和“phylia”（性爱）构成，字面意义来说，即是“恋技癖”。在维利里奥看来，今天的我们对各种技术物的过度迷恋是一种“淫秽”（obscenity），一种只有将自身身体与技术物的结合、亦即只有经由我们与技术之间发生性爱才能获得快感的“性偏移”。（*Open Sky* 111）。

维利里奥认为，这种“恋技癖”直接的风险即是，“义肢”以其“间接化”却远远更为“强化”的能力，可能对人自身身体的运动能力、对人自身的直接感官能力，造成一种“败坏”。这种冲击和损害首先表现，当“义肢”替代了我们自身的身体去完成各种任务，这使得对于自身身体的使用被搁置了。维利里奥举例说，当我们坐在一个汽车这一载具类“义肢”的柔软的座椅上时，我们使自己处于舒适的姿势之中，肌肉被放松，因而肌肉将会拒绝使自己被调动。载具类义肢创造了体态舒适，视听类“义肢”，比如电视，也同样创造出一种精神的“舒适”，我们自己的感官能力被搁置了。我们下意识地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义肢的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忘记了，这些义肢其实就是将自己嫁接到了身体运动之中，汽车技术其实是“我替你跑”，视听技术其实就是“我替你看”，但我们却以为一切都是由自己的身体来完成的，这种幻觉使得这种“替”的性质被忽视了。我们甚至认为，自己的能力可以成倍增加了，比如，汽车，它比我们的身体更快了，电视的实时远程播送，也使我们自身意识的速度和视看的速度被加快了（*Pure War* 88）。

当我们逐步将自己的能力搁置，而依靠义肢去达成目的，长此以往，我们

自身的能力就被弱化，因为至少表面上看来，“义肢”创造的能力强于我们身体自己的能力，汽车的运行速度远比我们身体奔跑的速度更快，计算机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远比我们大脑计算的速度更快。我们因而下意识地摒弃自己能力相对较弱的身体。当手机中的种种应用可以替我们记忆，记忆能力也自然会倒退；再者，就是对调动自身直接体验的“无欲望”。当义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真实细节”，当义肢能够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移动，我们如何还能有强烈的动机，去主动调动自身的身体，去感受、视看和移动？维利里奥担忧的是，“义肢”发展的历史，其实反过来正意味着人类自身身体越发虚弱的历史。一旦技术发展，“义肢”能力强化，人类自身身体的短处和缺陷得到弥补，进而发展到，人类的身体能力相形见绌，其能力显得多余、过剩，于是“义肢”代为完成各种目标。身体在技术发展的对照之下越发处于尴尬的境地。

如维利里奥所说，在原始社会，人的身体在运输中曾经占据重要作用，有了马匹之后，人类可以依靠骑乘马匹获取速度，但大规模行军仍需要士兵的脚力。到了19世纪，机械运输机器发展，身体在行进/运载的层面中才不再重要。纳粹德国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在“一战”中曾是一个飞行员。他患有风湿病，如果身处19世纪以前，他甚至不具备参军的可能，因为军队经常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恶劣天气，他的身体必然无法支撑，但是，随着“空军”在“一战”中发展起来，他的腿疾就不再成为问题。他被调入空军，还成为了王牌飞行员（*Speed and Politics* 83）。“义肢”的发展增强了身体的能力，或者弥补了身体的缺陷，但其隐忧即是，与“义肢”的能力一直在进化这一趋势相比较，人类身体的劣势越发明显，相形之下也就越发无用。马克思也曾说过，随着机器的发展，“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所代替了”（《马恩文集》，第五卷，432）。因此，这是一个身体不断遭到“贬值”的过程，身体的诸多功能最终可能被“义肢”所取代，让身体成为“无能力身体”（Unable Bodies）。

在当代，这一趋势越发明显。维利里奥甚至激烈宣称，装配了种种义肢的现代人，与残疾人无异，我们被义肢所驱动，就意味着，我们本身有了某个残疾。比如说，我们被汽车带着走，我们就是运动-残疾，我们在电视机前看比赛，就是视看-残疾（*Pure War* 55）。人类技术义肢的功能和能力已经越发强化、多样化，随着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体自身的意识、知觉和记忆，似乎都已经显得“过剩”了（*Open sky* 19）。举例而言，当代人已经习惯于用手机软件帮助自己进行“记忆”大小事件和信息，那么，我们自己原生的记忆能力到底还有何用，会不会退化？再比如，维利里奥说，年青一代解读“文字”的能力越发下降了，这不是因为

他们的智力下降了，而是因为，随着电视、电影等各类视听供应在今天已经随处可见，浸淫于这一环境中的年轻一代，已经不能让文字在自己的头脑中“再现”。阅读文字已不能给他们带来愉悦，也不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对他们而言，图像才能被他们更快、更舒适地感知，而词语已经不再具备在他们头脑中“栩栩如生”的可能（*Vision Machine* 8）。

二、网络“义肢”与“终端人”

在维利里奥看来，种种“义肢”激增的现代语境下，现代人的身体越发边缘化，如瓦莱里所说，今天的我们丧失了“自己身体就是能量来源”的这一内在感受（losing the capacity to experience himself as a centre of energy）。因为生物体和汽车、轮船等机械载具的区别在于，后者的驱动力来自于某种异己性的燃料（通过化合作用或能耗），然后才带来了它们的运动。当前工业时代的人类需要开始完成某个动作时，他能够感觉到能量是来源于自己身体内部，而这种感受又往往与某种具体的“形式”紧密关联。比如，对前工业时代的人们而言，早晨随日出起床是极为正常的，几乎就是一个简单的条件反射。但是，到了现代人这里，“自然醒”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只能借助于闹钟的催促才能起床。也就是说，今天，人们很难感觉到驱动力是自然而然地来自身体内部，而是处处陷入“被动”的境地，必须借助于外来力量、尤其是技术力量的刺激才能完成目标，即便这个目标极为简单。属于我们自己“内感受性”（proprioceptive）的“反射”（reflex）越来越少，“外感受性”（exteroceptive）的“反射”却越来越多。这就是一种技术发展后造成的身体的异己化、外化，乃至无用化。（*Open Sky* 110）

“义肢”的“间接体验”对人类身体的“直接体验”的影响和转换在电脑和因特网发明后，达到了顶点。维利里奥特别强调，将“义肢”仅仅看作是一种工具，特别是将其看作是一种人类器官的延伸，这一定义其实有其局限。如果说，仅仅停留在机械（mechanics）层面，停留在物质（mass）的层面，这一定义还是有效的，但是，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当“义肢”发展到“信息”的层面，他认为，这一定义就需要修改了。也即，在这一层面，我们不能说，“义肢”“延伸”了人的身体，而是在一种自动化的情境中，造就了身体的彻底“脱节”（Disconnection）：只剩下可以忽略不计的手指端发出的电磁脉冲，只剩下处于极惰性中的静止不动的身体。这样的情况下，身体已经成了“无用之物”，如果还说“义肢”是身体的“延伸”，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也正因为身体在电子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剩余”（superfluous）之物，它感受不到自己是“能量”的来源中心，也就再正常不过

了 (*Open Sky* 111)。

计算机和网络的“义肢”带来的效应因而值得我们一再思考：从速度上来说，它是“实时”(real-time)的，也即，它逼近了光速，相比于地球表面有限的空间，它是“绝对速度”。从功能上来说，它是复合型的，人们可以用它来进行视听，运算，获取信息，或者直播世界任意角落正在发生的事件。从工作机制上来说，它是“控制论”的，具有远程的连接能力和控制能力，可以将其它“义肢”的能力统合，一般性“义肢”的功能是单一的，其运作是各自分离的，然而，电脑和因特网却可以将所有别的“义肢”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成为一种义肢“集合体”。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尤其发达的今天，人类理论上只要在一台电脑前点击鼠标和键盘，就可以整合所有的义肢，完成所有工作。电脑和互联网抵达了“全能”(omnipotent)和“遍在”(omnipresent)的境地。虽然电脑由人操控，但是，当人将自己融入到这样近乎全职全能的义肢时，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力，同时，也同时放弃了自己的“直接体验”。在此种情况下，人类与网络“义肢”相融合，当运算、视听和传输高度整合，人类的将来，就是全身被联结上各种装置和设备，并且会被接入各种“界面”(interface)，如摄像头，键盘，显示器等等。当人们的身体都配备了发射器(Transmitter)和接收器(Receiver)，一切便都始于身体(发送)，也终于身体(接受)。此时，网络义肢让人类身体完全沦为充当传输和传感过程的一个“终端”而已。因而，维利里奥称之为“终端-人”(Terminal-man) (*Open Sky* 11)。

装备上各种“义肢”的“终端-人”逐步放弃去“直接视听”的欲望，也放弃自己去“直接运动”的想法，放弃了经与人面对面交往的欲望，也放弃了由自然力驱动去实行“切近干预”(Immediate Invention)的欲望。今天，人们已经不需要移动，就可以在家中购物、工作、乃至交友。如维利里奥所说，“宅文化”这种生活形态必将在未来的城市中蔓延开来，今天，年轻一代人越来越多的“御宅一族”即是代表，而今天的互联网、网络购物和物流系统使得“宅”式生活完全成为轻易实现的现实。今天的“终端-人”所需要“动”的只是眼球和手指而已。我们将再次见证一种转换。“交通革命”为我们所带来的“普遍移动”(general mobilization)，在今天，因为远程通讯工具的流行，因为手机、电视和网络，将会让位于一种“普遍不动”(general inertia)。我们不再是一群“比邻而居”的人，而是依靠设备和众多网友在赛博空间“共居”的“终端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形象 (*Open Sky* 20)。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已经经历依靠自己身体的“行动”(mobile)阶段，到汽车和飞机发明后的被载具所“驱动”(motorized)阶段，到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达不断趋于极端，我们即将迎来“指动”(motile)阶段——我们所有需要做的动作不过就是动动手指而已，甚至可能在将来只需要动动眼球。维利里

奥的质疑是，在这看似一切已然完备于眼前的状态中，我们唯独遗忘了真实空间和真实身体。如果真像晚年的霍华德·修斯那样，徒然剩下一具不移动的干瘪身体，这样幽灵般的生活，是否真得值得追求？

当我们被转换为“终端-人”，遗忘了真实身体，那么，以真实身体为中心的所构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也就遭到转换。我们以往感受空间，是以自身身体所处的区域为核心的，离自身身体越近，往往自己对这种空间感受会越强烈。时间感也是如此，它建立在某种“本地化”感受的基础上，自己所住区域的形貌变换往往最能催动自己对时间流逝的感受。但是，在今天，就空间而言，空间感受将不再以物理距离的远近为衡量标准，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与“邻人”的交往还远远不及与“远方人”的交往更多。维利里奥所举的一个美国网友的例子，告诉我们，所谓的“街坊邻里”（neighbourhood）一词在今天将如何被重新定义：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国女孩朱安（June Houston），因为某种心理疾患，总是担心家中被幽灵所入侵。为了对抗这样困扰她的“幽灵”，她把家中的一些角落装了十几个摄像头，并通过远程网络连接将摄像头的“视看”权交给远方的网友。朱安向记者说，她感觉这些网友们都成了她的“邻居”了，远方的网友可以随时目击她身边发生的一切，可以帮她一起“监控”幽灵，而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不愿意让现实生活中的邻居们去帮她，这会让她感觉自己的私人生活被“曝光”了（*Information Bomb* 58）。

维利里奥说，朱安所做的，和我们往常所理解的、一般性的为了防止入室犯罪的摄像头监控完全不同，她的行径和自述中含有某种耐人寻味的矛盾：一方面，她已经不再能够从附近的人那里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因而拒绝将自己的生活“曝光”（exposure）给身边人，但另一方面，她又借助于网络所带来的新型的“远程监控”，将自身的居住空间、乃至将自己的焦虑和恐惧“过曝”（over-exposure）给远方的网络世界和陌上的网友。朱安对身边世界的恐惧，以及对远方世界的信任和“准入”（admission），令我们看到今日“社区”之特性，即一种新的属于无数“终端-人”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它表征着一种“本地性”（localness）的转换：传统的“本地性”是基于真实身体在真实空间中的在场，我们的空间感，我们对于远和近的感受，是建立在这种在场的基础上，传统的“社区”或者“邻里”所以能够构成，即基于这种本地性、基于这种真实空间中的身体切近。然而，在网络时代，网络“义肢”放逐了身体在真实空间中的“在场”（presence），只剩下剥离了真实身体之后的新型在场，一种“远程本地性”（tele-localness）的“幽灵在场”（phantasmic presence）（*Information Bomb* 59）。其结果是，一旦抽空了“身体”在空间感受中的基准性，空间感将彻底被逆转：比邻而居的人对我来说是如此遥远，远方的陌生人却让我感觉如此之近。在此基础上，尼采所说的“爱远方人胜过爱

邻人”就在今天被讽刺性地实现了。

空间维度之外，时间维度也被今天的网络义肢转换了。伴随着全球移动网络的大规模普及，每个人的手机摄像头就是一个活动的摄影机，CNN 向全球派驻新闻线人的做法已经落伍了，因为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新闻线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将身边的情境上传到社交媒体，转瞬之间和全球的网友分享。电视时代的“罗纳德金事件”放在移动网络的时代完全可能会带来更加疯狂的效应。我们今天和全球所有的网友都在一个时间维度上，也就是，今天已经完全是一种“实时性”的“世界时间”，而非“北京时间”或者“纽约时间”这样的“本地时间”，所谓的“世界时间”，举例而言，就是当 2018 年物理学家霍金死亡，全球所有的媒体都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所有的手机用户都第一时间收到了信息，全球的网友、无论他在北美还是欧洲，都在第一时间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对这一事件展开了讨论。这种“全球时间”携带有一种“过-反应”（over-reactive）的特质，使得全球网友——哪怕他们完全不懂理论物理、哪怕他们远在中国——都在同一时间一起煞有介事地集体怀念霍金（*Information Bomb* 112）。今天，因为网络“义肢”，我们所有这些“终端-人”都已经处在一个“时间线”之上。

三、“内殖民”：“义肢”的新阶段

但是，当我们拥有了火车等充当载具功能的义肢，有了电视这样的充当视听功能的义肢，以及后来更加综合了各种功能、具备实时传播能力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的“义肢”之后，维利里奥指出，还有一类在不断发展的“义肢”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曾几何时，“义肢”，只是对人类身体的一种外部的“协助”，而维利里奥这里所谈论的这类“义肢”已经与身体相“融合”，已经被“嫁接”于身体，甚至植入身体的内部，进而发挥作用。

在维利里奥看来，自有生命诞生以来，物种的生存就是一场淘汰赛，生存的过程也就是一种不断的淘汰、消灭、清除的过程。但他更加强调，这种“淘汰”归根结底是一种“速度”的比拼：猎食者淘汰掉“速度”逊于自己的猎食对象。人类社会之中，那些无法使生产和流通的进程加速的群体将被更快的另一拨群体所消灭。但这样的“淘汰赛”不单是一种“消灭”对手的过程，更加要“消除”部分“自身身体”、以及消灭“地域身体”（地表）的“部分元素”，使得“速度”能够提高，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于是人们通过运动减轻自己的体重，保持自己反应的敏捷和运动的快速；人们会开凿、打通地表上的高山与榛莽这类地表的地形障碍，使得地表更加适合速度的传导。同时，人们还需要建立起与此相配合的各种“基础设

施”，使得速度潜能充分释放，或是建立起体育馆，竞技场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或者修建起各种道路、飞机场、火车站用来作为交通枢纽。“地域体”（territorial body）被人类用一种运动员/竞技者的“动物体”（animal body）方式加以重组。种种开拓和扩张，都是为了方便速度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Art of Motor* 104）。

不过，今天我们所能获取的速度早就已经超越以往。我们的速度不断突破各种“障”，突破了“音障”，随后突破“热障”，今天，随着网络传输所带来的“绝对速度”已经逼近光速之“障”。相较之下，地表的表面积已经极为“有限”，因而毫无再能释放速度的空间。领土边界的概念在今天已然没有意义（这一点已经在“海湾战争”等以后各种当代的信息战中得到了体现），所谓的“全球”与“当地”，将不存在区分。因为我们对“绝对速度”的操作，地球表面相对之下极为有限，所有的量级都被相对化了，向外扩张已经走向极限了，于是，往内扩张在所难免。当我们自身所处的地域视域形于丧失，我们的所有“尺度”也随之丧失。在地表之上，已经没有啥东西是“大”的了、或者是“远”的了。我们现在只能把开拓的“视角”向内转，现在，这种“淘汰”/“竞速”只能在生命体的内部开展开来。我们只能操演一种“内-器官”（intraorganic）的内窥和内侵。现在，人类身体的内部空间将是最后一块待征服的“领土”（*Art of Motor* 109）。

当“地理空间”之“扩展”（*expanse of geographical space*）走到极限，进而带来“时理时间”之“延展”的缺位（*chronographic time's absence of duration*），在此情况下，若是要使得身体能够和今天这个时代的瞬时远程技术相同步，我们必须打破古典式的身体的“内”/“外”之隔，因为这样的“隔”使得速度潜能无法完全释放。我们将促成一种最终极的“中心性”（*centrality*），或者说，一种时间的“超-中心性”（*hyper-centrality*）——尤其是“现时时间”或“实时时间”的“超-中心性”。人类身体的“实时时间”的“超-中心”，将会压倒外部“真实空间”中各种具体化的“中心”，最终一切“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将会被打破。在今天这个历史阶段，新的“淘汰赛”不单单是要让我们消灭自己身体的某些重量、赘肉，让其运动更快，力量更强，它更加让我们自己试图去改变自身的生命节律，因而需要让我们的“义肢”走向身体的内部、以及与身体相联结，去改造、强化自己的身体（*Motor* 10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利里奥总结说，人类技术发展其实可以归纳为从“向外”到“向内”过程中化工的“三次革命”：从运输革命（*revolution of transportation*）到通讯革命（*revolution of transmission*），这是一个不断强化和拓深对外部真实空间的征服的过程，今天，技术开始“向内”转，开始向人类的身体进发，此即生物学和材料科学带来的新的革命——“移植革命”（*revolution of transplantation*）（*Open Sky*）。在此过程中，“义肢”不再只是从外部“协助”身体，而是要凿刻身体、

穿透身体，甚至直接进入身体的内部空间，从而发挥作用。这类新型的“义肢”不是为了人类逃脱猎食者的需要，也不是出于医疗矫正和治病救人的需要（残疾人的助听器和电动轮椅当然也是“义肢”的一种，但并不是维利里奥所重点言说的对象）。在此情况下，达尔文的学说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已经式微。举例而言，良好的视力和听力曾经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使得人们免于被捕食者俘获，但今天，所有听力和视力上的缺陷都已经可以通过工具来矫正。实际上，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早就已经是一个技术性的人工环境：“技术圈”（人工环境）的影响已经压倒了“生物圈”（自然环境）自身的作用（*Motor* 115）。

今天，我们发展出了林林总总的“内侵式”义肢，他们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这其中的第一步，也是初级的“义肢”，是种种通过口服而直接刺激人体、给人体带来愉悦和活力的各种人工制品。咖啡、酒精和烟草这样的刺激物即是代表。当然，我们更是很快有了运动员为取得更好成绩而服用的兴奋剂（*Motor* 102）。除了这些内服的“刺激物”之外，顺着这一强化自身的逻辑，更进一步的“义肢”是今日所谓的生命科学和纳米技术带来的种种改造身体的技术物：异体器官移植、人造器官的植入、乃至种种更为先进的微型电子器件在身体内的植入等等。因此，就像我们曾经凿开地表、建成道路等“基础设施”，从而使得马车、火车等种种移动的载具的速度能得以释放，今天，我们也要给身体架设种种技“基础设施”，要让身体也彻底成为速度传导的无障碍的平台，于是我们直接改造自己的身体，让“义肢”成为与身体真正“融合”的一部分。

维利里奥所举的这类新型“义肢”的典型代表即是澳大利亚行为艺术家史特拉克（Stelarc）。史特拉克通过移植技术，给自己额外安装了一支机械手臂，并通过传感器对这第三只手加以控制，还通过电脑编程去控制机械手臂完成舞蹈表演。维利里奥认为，这种通过对自己身体入侵而改造自身的所谓“先锋艺术”，并无真的艺术性可言，而只是为了通过一种耸人耳目的手法去确认自己的“先锋性”。史特拉克的所作所为是当代人运用“义肢”来改造身体的一种重要表征，它已经印证了，在今天，我们如何通过“义肢”完成对于自身身体的狂想式的“元-设计”（meta-design），完成一种人与技术之间的“共生”（symbiosis）（*Motor* 110）。这种对于身体的僭越无有止境，并更加从改造身体的“外层”进化到重组身体的内部空间。人的身体内部空间本来完整、自足和封闭，只有在外科手术这样的极端情况下，这一空间才会被打开，但也会随即再度闭合。但在今天，技术发展的触角已不止于此，它寻求对身体更彻底的、更持久的支配。因而，借助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种种可以侵入身体的“义肢”，也即种种微型技术物，进入

身体，完成植入，乃至融合与强化。日本“丰田”实验室的负责人宣传，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发明出蚊子大小的微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可以永久性地在人类的血管里自由游走，随时探索和监测人类器官(*Open Sky*,49)。在此情况下，肉身空间，也就是身体的混沌和封闭，经此永久性的植入，就意味着被持久地穿透、注视和掌控。

至此，种种义肢即将很快完成“内转”的使命，今天我们已经能让种种瞬时传导的矢量能够走向身体的内部，让“速度”的传导从此再无阻隔，只不过，这样的速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物理位移的“相对速度”，而是电磁传导、微观物理传导和网络实时传输的“绝对速度”。这类新的内侵义肢的嫁接已经完全超出了弥补缺陷、救治病痛的需要，其本质是要通过技术管道的接通，使得人类能够通过主动通过电流和电磁直接作用于自己的神经和肌肉，让身体可以被外来动力（比如电流）彻底地“机动化”（motorization），而不需要主体去主动动用。而且，这种“机动化”还不是随意的，它还配合着今天的电脑信息技术，使得“机动化”的方式可以通过编程来事先定制，进而彻底被掌控于人们的手中。也即，“内侵式”义肢对身体的改造，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出发的，一是更深层次地使得身体可以被源源不断的电流、或者电磁脉冲等技术性外力所驱动，最大程度地减少主动动用自身身体的可能，二是更深层次地进入身体内外所有的角角落落，让这个曾经的混沌的、不可触摸的空间，变得无限透明，无限可塑，彻底处于人类主观意愿的掌控之下。正是因此，维利里奥一直在提出“临界空间”的概念，不仅仅是我们的地表外空间在濒于消失，处于“临界”状态，我们的身体内部空间现在也正在成为“临界空间”。

因此，在维利里奥看来，我们已经讽刺性地完成了尼采的“超人”构想，不过，今日之“超-人”（surhomme）的真实内涵其实是“超-应激-之人”（l'homme surexcité），一种因持续遭受外来刺激而过度活跃的生命体。此种刺激不单单是指施加于人类的肌肉组织和运动器官的刺激（通过健身和锻炼、以及类固醇的注射），更加还会刺激到人类的神经系统，刺激人类的记忆活力和想象活力，甚至像认知科学家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所鼓吹的那样，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人脑中植入新的想象模式、知觉模式和思考模式。这将会带来整个人体的生理学重构（*Motor* 105）。以往致力于开拓地缘空间的“最少行动法则”（伴随的是交通革命和通讯革命）就要被另一种法则所取代，这就是一种更加适应微观物理的“移植革命”的新的法则。今天已经是“刺激法则”（law of stimulation）的时代。这种法则旨在促进人体的反射和刺激的加速。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技术科学的进步，是为了精简因地球引力带来的必要努力，使得肢体免于疲劳，以及要使自己免于因为自身质量和生理密度而带来的神经疲劳。今天则已经不满足于祛除种种疲劳

了，而是要“过度-刺激”人体的有机组织，是要“编制”（program）神经和智力活动的强度，就像机器马达的功能也可以事先被编制的一样（*Motor* 124）。

我们更可以说，我们今天已经“超额”完成了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的构想。维利里奥指出，马里内蒂在 20 世纪初期曾经在如此展望，本世纪的人类将会通过各类机械，通过种种不可见的微型马达，制造外来的速度，让人类的身体成为完全由这样的“速度”所驱动，使身体的运动速度大幅提高。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的实际可能还要超过马里内蒂的设想。马里内蒂只是想到，通过“微生物机器，把人类的身体彻底驱动起来，成为一个高速运动体，达成速度的激增。但是，他想不到的是，处于信息时代的我们，不但可以以外来的高速“驱动”人类身体，还可以“重组”人类的身体，因而，我们植入自身身体的“义肢”比他所设想的高速马达先进得多，我们不单可以让义肢驱动身体，我们还要让“义肢”和信息技术联结起来，我们要供应给身体的“义肢”严格来说更近于一种“收发装置”，以使得它能够跟上我们今日种种电磁传导的绝对速度——一种准光速，而不单单只是一种高速的马达，或是一种动力的供应者（*Motor* 103）。

不过，一定会有人反驳说，很多植入式技术，比如心脏起搏器，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如此激烈地批判它们是否值得商榷。维利里奥声称，他并不反对为了拯救生命而做的种种移植手术，只要这种技术仍然维持在“疗救”（Therapy）的范围内，他当然支持。但是，当科学家宣称，未来的有一天，微电子技术、纳米技术会帮助通过在人脑内的植入，帮助人们进行“记忆”，这种生物技术就已经脱离了他所说的“疗救”的范畴，而进入到了“义肢-人”（Prosthetic-man）的范畴（*Worst Politics* 54）。心脏搭桥和器官移植，这种技术的植入都是修补、疗救性质的，且这种修补还是静态的，因而这些被植入的“技术物”并未对身体达成“操纵”。但是一旦植入技术走得太远，形成“内-器官”式的微型机械（Intro-organic Micromachinery），在将微电子器件移植到器官内部之后，可以通过遥控技术这样的路径，和身体外面的监控者达成“互动”，这就像是给身体搭上了管道，彻底打通了内外之隔，为随时的操控提供契机（*Open Sky* 53）。这种动态的、主动性的、且是随时居于人类掌控下的植入，在维利里奥看来，就是对身体的“殖民”，就像当初人们对于地球空间的不断征服也是一种殖民一样。铁路、火车和飞机的发展使得人们殖民了“地域身体”，这算是一种“外殖民”，今天，我们征服自身的“动物身体”，其实就是一种“内殖民”（Endo-clonization）（*Worst Politics*, 54）。当这种“内殖民”走向顶峰的那一天，人类的身体就将被掏空，代之以一整套的技术装置，在这种情况下，维利里奥的质疑是：“人类”与“跨人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是否还算是“活着”？

四、一种参照：斯蒂格勒的“义肢”论

显然，维利里奥对于义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但是，关于这一对于义肢的负面评价，我们也不可过度偏信，这里不妨将当代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文本拿出来做出一番对照。因为斯蒂格勒同样在《技术与时间》等文本中探讨了“义肢”的问题。我们看到，对于“义肢”的理解，斯蒂格勒和维利里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对于“义肢”的界定，斯蒂格勒和维利里奥之间就存在着本质性的分歧。对维利里奥来说，义肢的定义并不复杂，结合他在文本中的使用情况，“义肢”就是人类所使用的、增强了自己原有的肢体能力和感官能力的工具，尤其是种种现代的“技术物”。对维利里奥来说，仿佛首先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原初的“人”，或者说原初的“身体”，因为外来的现代“义肢”的诞生，使得这样的“纯粹性”遭到了破坏。这一论断显然将“义肢”视为后起于人类身体的、为人类所发明的种种“外来物”，将“义肢”和“人”（或者说，人的身体）这两种存在对立了起来。他批判现代“义肢”，实际上也就是从现象学维度暗示了一种想象性的、未受现代“义肢”“侵害”的“人”的存在。一旦有了这样的拟想，那么就将面临着一个逻辑难题，即现实中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曾经存在这样的“纯粹状态”的、未被“义肢”损害的“原初人”（original human）？如果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果不存在，那么拟想这样的“原初人”意义又何在，而今天的“人”的源头又在哪里？是否为了规避“义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得回到前文明时代的原始状态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在维利里奥的文本中得到正面的回答。因此，谈论“义肢”，实际上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和“义肢”的关系这一问题，并且最终归结于对于“人”的理解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来。

按照斯蒂格勒对于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梳理，我们发现，维利里奥对于“人”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说更接近于卢梭。卢梭认为，最先存在着的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人，以果为食，席地而睡，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就在手边”（close at hand），一切都是直接性（immediate）的。这种自然状态是他的最佳状态，他不需要使用“义肢”，他维持着原始的强壮和敏捷。可是，当人类开始在一种“偶然”状态下（by accident）学会工具，就是“堕落”（The Fall）的开始。斧头、梯子、马这些最初的工具手段和人为之物，即已经和今天的“义肢”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些东西“代替”了人的自然的、原始的状态，是一种“手外的”力量（power beyond reach of hand），一种“间接的”（mediated）力量。纯粹自然状态下的人，所拥有

的一切就是他自己，一切都“内在于他自身”，他的身体是他唯一的凭借，原初状态就是一种“内在化状态”，一种“纯粹状态”。当人类开始使用并非是“内在于他自身”的“工具”的时候，当他开始经历“义肢化”（prosthetization）和“外在化”（exteriorization）的开始，也就是“分化”（differentiation）的开始。“义肢”因而也就是“不平等”的开端（*Technics and Time* 116）。斯蒂格勒指出了卢梭论述中的内在难题：卢梭实际上从来没有能够给出一个原初之人的真实的例子，无论是诉之历史真实还是现存真实，他“先验地”假定了一种“纯粹状态”，一切对于现有的人类文明的批判都指向了这种纯粹状态，却难以证明这种纯粹状态的实存性，因而，他最终只能用“偶然”（accident）这样的语汇去解释“第二起源”（the second origin），去解释“纯粹状态”的“原初人”到“义肢人”这样的历史性“飞跃”（*Technics* 117）。

对斯蒂格勒来说，首先要重新厘清的就是“人”的定义。他引用了人类学家勒华·古杭的论述指出，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纯粹”的、未受“工具性”影响的“人”。“人”本身就是伴随着工具性（instrumentality）的诞生而诞生的。甚至可以说，人的本质就是“技术”（*Technics and time* 125）。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发现，四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就开始使用最原始的“工具”了。当然，需要具体指出的是，开始学会使用石器这样的原始工具，并不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技能，是因为“人”先学会了直立行走，它带来了整个上半身正面区域的重组，决定了上半身两个极点之间的新的关系，进而带来了一连串的进化：手从爬行的功能中解放了出来，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呼唤“工具”——一种移动器官——的诞生；面部从衔取的功能中解放出来，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面部表情，以及随后而诞生语言。属于手的工具和属于面部的语言构成了同一机制的两极。大脑在其中发挥作用，但不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它仅仅是整个身体机制中的一个部分，是整个机制的进化带来了大脑的进化，大脑的进化是这一进化的受益者，而非决定者。先有了手和脸的有机联系，才随后有了大脑的进化（*Technics* 145）。

概而言之，一切开始于双足行走，手被解放，进而有了工具，进而有了语言的诞生。因而，是一种新的“机动性”（mobility），一种新的时空关系，而非一种新的智能，决定了从猿类向人类进化的关键一步（南方古猿已经是“人”，虽然他们的脑容量很小，但是因为直立行走，他们的脑结构组织已经和猿类根本不同）。这是一种独属于“人”的“运动”（movement），一种使自身趋向于“在手”这个范围之外（putting itself outside of the range of its own hand）的运动，“义肢性”，是手被解放出来之后的后果，是一种“朝向自身之外”的运动，这种“解放”，作为一种“外在化”，决定了“人”的诞生（*Technics* 146）。从“外在化”开始的一刻，作为一个生命体的个人，就不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身体而活动，他必须借助于工具（也即“义肢”）而活

动。这里发生了一种技术的“助产”（maieutics）。或者说，“内在”和“外在”就是同一种东西，“内在”即“外在”，因为“人”（内在）本质上就是被“工具”（外在）所定义的（*Technics* 141）。人的出现就是技术的出现。是工具，也就是技术“发明”了人，而不是人发明了技术。或者说，是人在“技术性”地“发明”了工具的同时，也“发明”了他自己。诚然，技术诞生于人之手，但“人”同时也被“技术”所“发明”。“义肢”的历史就是人被“发明”的历史。因此，我们看到，在斯蒂格勒那里，“义肢”，从“人”诞生的开始，就已经是“人”一部分了。“义肢性”从“人”诞生之初就内在于人的身体。“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别的生命体，就在于，人本身就是一种“义肢性”的存在，也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斯蒂格勒强调，一是，“义肢”并不取代任何东西，不取代任何本应在先存在继而又被丧失的东西。二是，“义肢”并不是人类身体的一个简单延伸，它本身就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构成。它不是人的手段，而是人的目的。

我们看到，斯蒂格勒和维利里奥对“义肢”的认定基于不同的出发点，维利里奥将义肢视为一种外来之物，将“义肢”和身体对立起来，而斯蒂格勒将义肢视为“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技术与时间》提到的爱比米修斯神话，人类从起源处就是一种“缺陷”的存在，他们不像动物一样具有各种“性能”，因而也就只能依赖技术性的“义肢”而生存。虽然，斯蒂格勒也认为，种种现代的“义肢”给“身体”带来了负面效应，但他的批判指向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而非一种单纯形而上层面的思考。斯蒂格勒认为，经由种种现代的技术性“义肢”（斯蒂格勒称今日的“义肢”为“药罐”*pharmakon*，也称之为“装置”*apparatus*），身体，尤其是人的“知觉”（*perception*）和“关注”（*attention*）经历了一个“语法化”（*grammatization*）的过程，即一种“身体流动的离散”（*discretization of corporal flows*）——祛除身体知觉原有的连续属性，使其分离化、单位化，从而成为便于“装置”去加以处理的对象（维利里奥曾在《消失的美学》中写到电影装置所带来“失神”体验，也可视为是这种“离散化”所带来的效应之一）（*what* 50）。但是，批判这种“语法化”，在斯蒂格勒看来，应该要将矛头指向它的背后的资本，因为这种“语法化”是出于资本获利的需要，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剥削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今天的人们身体被工业化的“义肢”所捕获而进入“无产化”的过程（*What* 52）。“义肢”的负面后果，不在于“义肢”本身，不在于“义肢”带来了身体层面的受侵害，不在于人们使用“义肢”而带来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身体的丧失，而是在于，“义肢”被纳入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成为今天的人们被“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重要手段。

如斯蒂格勒向我们所指出，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身体被工业化药罐“征用”

(expropriation)，其目的在于构建在一种“跨个人性”(transindividuation)的新型周期——“短周期”(short-circuits)，而这一“短周期”最终是为了资本服务的。受制资本流通的需要，流水线越发的自动化，产品越发复杂化，为了最快地获得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些产品不断提升更新换代和淘汰的频率，一切为了促进新一轮的“消费”而生产。这种“短周期”旨在最大程度地限制一切形式的“延异”(différance)——即限制一切的差异和延迟(What 50)。生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循环，即从投资，到产品报废，到新产品上市，这个过程必须越来越快(我们从今天手机越来越快的更新换代的速度中即可见到)。与此同时，“大众”(the mass)这一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群体(而非个性化的“个人”)必须被制造出来，即人的“独一性”(singularity)必须被剥夺，因为“独一性”抵抗着“大众”这一“群体”的工业化制造，抵抗着这一群体所必要的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和思考行为的“超级-同步化”(hyper-synchronization)(What)。今日的种种“义肢”，无论是电器，还是汽车，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的“短周期”之中，一切最终是为了资本自身快速获利、投入快速获得回报而服务。

这种“短周期”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无产化”——“知识无产化”。如斯蒂格勒所说，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其实已经谈论到了“知识无产化”的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当机器不断发展，独属于工人的“技能”(savoir-faire)被转移到了机器之上。(What 53)。比如，工人对通过自动化机器生产出来的纱产品的原理和结构的熟悉，与传统手工纺纱工人对自己手中的“产品”的熟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工人们虽然是“生产者”，但是他们离产品的实际生产越来越隔绝。此即“知识无产化”。但是，斯蒂格勒强调，今天的“知识无产化”还不仅于此。今天不单单是人们关于“制造”的知识被“无产化”了，更在于，“生活”(savoir-vivre)的知识都已经被“无产化”了。资本主义需要确保的是，让当代的这些无产者离开了现代“义肢”，就都不知该如何“生活”了。它要确保，人们只能作为一种“消费者”，用薪水被迫去跟随着这样“短周期”，如不跟随，则正常的生活都绝不可能。这种“知识无产化”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彻底，因此，斯蒂格勒称之为普遍无产化”(generalized proletarianization)。“普遍无产化”在人们身上强加了一种“系统性愚蠢”(systematic stupidity)的状态，从而保障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What 53)。

今天，人们生活中所使用的“义肢”，都无法逃脱这样的资本的“药罐学”(pharmacology of capital)。人们对“义肢”的“需求”不是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像鲍德里亚说的，在“消费社会”，“需求”是不断地被“制造”出来的。我们以“手机”为例。这样一个再常见不过的现代“义肢”而言，如果手机的使用者试图坚持做一个有“个性”的恋旧者，坚持使用老式的非智能机(只具备基本的 SMS 短信和通话

功能)，他将发现这一“坚持”将无比艰难，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智能机”被附加了诸多“功能”：比如，智能手机的社交媒体应用可以让人仅使用流量数据就可以快捷沟通，而不需要可以使用“短信”这种既费钱又麻烦的通讯方式；又如，用“智能机”可以进行高性价比的“网购”，否则就只能进实体商店的购物就是费时且昂贵。也即，如果不使得“智能机”，他已经无法顺利将自己嵌入当代的诸多生活场景之中，因而显得无比的笨拙与不合时宜——不使用智能机，他作为一个当代人，就只能让自己陷入不会“生活”的状态了。因此，对斯蒂格勒来说，今日的问题不单单在于，一个手机工厂的工人根本不知道诞生于自己之手的新手机到底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于，这个工人尽管薪水微薄，他自己却不得不用整整一个月的薪水，被迫在一到两年的时限之内就得为自己更换一个新手机。因此，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义肢”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并非“义肢”之存在本身之过错，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要批判今日“义肢”的种种问题，也必须基于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而若是要抵抗这样的秩序，则需要经由一种知识的“去-无产化” (de-proletarianization)，从而重建一种“个体化” (individuation)。

结语

维利里奥从“义肢”与“身体”的关系出发，指出“义肢”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人类逐渐依附于义肢，使得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直接体验逐步被义肢化的间接体验所侵蚀。这其中，义肢发展到今日，已不单单是传统的手工工具、以及汽车、飞机这样携带着“相对速度”的移动载具，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已经实现“绝对速度”传导和实现“远程控制”的网络义肢，以及已经觊觎身体内部的内侵式义肢，它们所带来的种种效应更为极端，使得我们所居住的“地域身体”的外部空间和自身动物身体的“内部空间”遭到持续的控制和侵占。不过，与维利里奥相对的是，斯蒂格勒则认为，“义肢”和“身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他的隐忧是：今日的种种“义肢”正在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一种新的“知识无产化”使无产者被更深层次、更为隐秘地剥削。